

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

王中忱

鲁迅所藏托洛茨基(1879-1940)的《文学与革命》日文译本,茂森唯士译,改造社出版,1925年(日本大正十四年)7月15日印刷,7月20日发行。1925年8月26日的《鲁迅日记》写道“往东亚公司购买《革命と文学》一本,一元六角。”而在同年日记所附的“书账”上记载“《文学と革命》一本,一.六〇 8月26日”。两相对照,可知指的是同一本书,而“书账”所记书名更为准确。日文版的版权页上所记定价为“二圆”,自然是日元的价格,而鲁迅所付的“一元六角”购书款,则应该是当时的中国货币。此后,鲁迅在上海的商业书店购买过此书的英文版,时间为1927年9月11日,据《鲁迅日记》同日记载,这是准备赠送给他的学生廖立峨的。另,1928年2月23日《鲁迅日记》记道“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と革命》一本,二元二角”。价格和1925年购买的不同,大约因为是精装本的缘故。现存鲁迅所藏日译本《文学与革命》有精装、平装两种。

茂森唯士译《文学与革命》由原著者的《序言》、《译者的话》和八章正文构成。《译者的话》介绍说“本书译自1923年秋莫斯

科‘红色处女地’社发行的俄文版《文学与革命》(Literatura I Revolutzia)中评论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题为‘现代文学’的该书前半部,总计八章。原著后半部由《从第一次革命到世界大战》、《西欧和我们》两章构成,皆为著者写于大革命前的文学评论的汇集,与本书所译内容截然区隔了开来,因此决定首先翻译该书的前半部分”。

茂森译本所载原著者的《序言》,是托洛茨基1923年9月19日为《文学与革命》俄文版初版本所写的。该书在1924年曾印行第二版,托氏于同年7月29日写的《再版序》说“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没有变动。仅增收进我在1924年5月9日俄共中央召开的关于文学的会议上的讲话”^①。茂森唯士没有谈及第二版,他的译本上的原著者《序言》也非托氏原文的全译,而是删去了《序言》中有关该书第二部的说明。茂森译本未收托氏原著的第二部,对《序言》做此处理也很自然,但托氏本人认为,第二部所收1907年至1911年的文章,与第一部的文章其实是有关联的,其“联系在于,过渡的、亦即当今的艺术植根于革命前的昨天。还有一个联系,它

来自作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统一性”^②。可见,原著者并没有把该书的前后两部分做“截然区隔”。

托氏的《序言》还用了相当篇幅,说明第二部把旧文中“谈书刊检查制”的文字收录进来的理由。托氏特别谈到,他很清楚“这些文字会给不止一个敌视革命的批评家以向苏维埃政权伸舌头的口实”,但他固执地坚持“为了不让批评家先生们失去这一幸运的机会,那样的文字一行也没有删去,即使在有些文字明显地有助于得出针对苏维埃政权的‘对称的’结论的情况下,也没有这样做”^③。托氏所说的“针对苏维埃政权的‘对称的’结论”,指的是“敌视革命的批评家”在书刊检查制度上,在苏维埃政权和沙皇政权之间做相关的联想。托氏没有回避而是很明确地说“我们有书刊检查制,而且非常严格”。他强调说,十月革命之前,“我们为了三段论与专制的书刊检查制做过斗争,我们当时是正确的”,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书刊检查制“不是用来反对三段论的”,“它反对的是资本与偏见的联盟。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怕为廉价的民主主义者慷慨做出的历史的类比”。同时托氏也许诺:“到了无产阶级在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中稳固地获胜的那一天,革命的书刊检查制就会因没有必要而消失”^④。

托洛茨基的这些议论,没有出现在茂森唯士的译本上,也没有出现在后来韦素园、李霁野翻译的中文译本上^⑤,鲁迅当年可能没有读到。

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原著者托洛茨基,研究文献已经很多,此处选择可以作为《文学与革命》的远景或近景的相关内容略做介绍。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1879年出生于沙俄时期的赫尔松省(属于乌克兰)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青年时代开始参加反对沙皇政权的活动,1896年参与组建南俄工人同盟,因此而于1898年被

捕,流放至西伯利亚。1902年秋从流放地逃脱,持假护照往欧洲,用名“托洛茨基”,以后便以此名行世。在伦敦,托洛茨基遇到列宁,为《火星报》撰稿,获得列宁的赏识,1903年开始列席编辑部会议,同年7月至9月出席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列宁派的主要成员,但不久因对列宁所拟的党章条文持不同意见等原因而转向孟什维克派。1904年,托氏退出孟什维克,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托氏回国,提出“不断革命”的主张,并担任过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革命失败后托氏被捕,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2月再次在流放途中逃脱,由伦敦转赴维也纳,在那里创办了《真理报》,后转往美国居住。1917年俄罗斯“二月革命”发生后,托洛茨基回国,5月抵达已经更名为彼得格勒的首都,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被捕,未能出席同月召开的旨在实行布尔什维克派和“区联派”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但在狱中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出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此一时期的托洛茨基支持列宁准备武装起义的主张,并在其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里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1917年10月25日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的《告俄国公民书》就是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的,可见其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和位置^⑥。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担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为结束革命前俄国作为协约国成员参加的对德战争进行外交交涉。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之后,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改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亲自领导组建了具有铁的纪律的正规化红军,对抗国内的反苏维埃政权势力和来自英国、日本、美国等十数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在1920年获得胜利^⑦。1921年,苏维埃俄国结束军事共产主义,开

始施行新经济政策,托氏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在当时“曾经被看作是党的观点的文件”,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⑧。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到,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托洛茨基的活动主要是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展开的。据《文学与革命》第一版《序言》,该书的第一部,也就是茂森译本翻译过来的部分,本来是作者在“两年前三篇旧文的序来构思的,但在1922年夏天休假时,写作计划扩大了。这工作没有做完,一直拖到1923年夏”^⑨。《序言》文末所署写作时间为“1923年9月19日”,据此推算,《文学与革命》第一部的构思大约开始于1921年夏秋之间,而实际动笔写作则在1922年夏天,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陆续在《真理报》上刊出^⑩,1923年出版单行本时,又做了“大量补充、修改”^⑪。此一期间,托氏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兼任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之职,工作重心则已转向国家的经济建设;而由于列宁的身体状况从1921年底起不断恶化,导致苏共中央的权力结构失去原有的均衡,托氏也陷入权力重组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后来发表的托氏自传在回顾这一期间的经历时,笔墨主要集中在与斯大林等人的政治分歧和斗争上,对《文学与革命》的写作却无一语道及^⑫,既显示了其关注的重心所在,也暗示了他观察和论述文学艺术的态度与立场。

这不意味托洛茨基不重视文艺。《文学与革命》第一版《序言》开篇即提出“艺术的地位”问题,并将其放在工人阶级国家的存立、社会主义历史原则的胜负这样的大格局中进行测定,明显显示了托氏作为革命政治家的特有观点。托洛茨基首先强调军队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保证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生存的最基本前提,特别指出“如果专政在最近几年不能组织好经济,让经济为民众提供出生活

最必须的物质财富,无产阶级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经济现在是在所有任务中的首要任务”。同时还指出:解决了“衣、食、取暖,甚至扫盲等基本问题”,“虽说是最伟大的社会成就,但是还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原则的完全胜利。只有科学思维在全民基础上的向前运动和新艺术的发展,才可能证明:一颗历史的种子不仅伸出了茎,而且还开出了花。在这一意义上说,艺术的发展乃是对每一时代的生命力和重要性的最严格的检验”^⑬。托氏对“无产阶级文艺”期许甚高,提出的标准也极为严格,他甚至认为:“根本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艺术”^⑭。

这一论断是托氏后来被贴上“无产阶级文学取消论”标签的主要依据,而托氏下此论断,是在他从人类文化历史的长程视野理解无产阶级政权的逻辑上引申而来的。在第一部第六章《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中,托氏就此做了颇为详细的阐述:“一种新文化围绕统治阶级而形成,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需要很长的时间,并常在该阶级统治上临近衰落的时代才达到完美”。而“无产阶级将自己的专政设想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时代”。“在专政的时代,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谈不上具有巨大历史规模的建设;再则,与过去无法比拟的文化建设,将在专政的铁钳已失去必要时开始,那时它就不具备阶级性了”^⑮。

托洛茨基高悬的“完美”文化标尺,自然会体现到他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评价。在以“现代文学”为题的《文学与革命》第一部^⑯,托氏首先以“十月革命”为基本标识,批评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学面对革命所显露的“迟钝”和“愚蠢”,认为因害怕革命而流亡海外的文学家毫无意义,不值一提,并把留在国内但没有积极认同革命的文学家称为“国内流亡者”、“岛民”。被托氏视为“非十月革命”文学的作家有别雷、扎米亚京、阿赫马托娃、

茨维塔耶娃等(见第一章《非十月革命文学》),多为后来的文学史所说的“白银时代”文学的代表。依据作家与革命的关系,托氏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指出“同路人”文学之所以和“非十月革命文学”有所不同,在于“它与革命有着或多或少的有机联系”。但对“同路人”能够跟随革命“走到哪一站”,托氏则持审慎的态度,不过他承认“同路人们如今组成了俄国文学一支很重要的队伍”,并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谢·叶赛宁、亚·勃洛克等人的内在复杂性做了出色的分析(见第二章《革命的文学同路人》、第三章《亚·勃洛克》)。在第四章,托洛茨基分析了俄国未来主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积极“投向生活新主人一方的推动力”,高度评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巨大的天才”,也指出其“放浪派的个人主义的傲慢”,并明确表示“说未来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艺术,这是极不严肃的”(见第四章《未来主义》)^{①7}。在第五章,托氏对为未来主义文学做理论阐发的“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进行了批评。在托氏看来,包括自己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什克洛夫斯基、雅克布森等形式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是“对于他们来说,‘太初即词’。而对于我们来说,太初即事。词语出现在事件之后,有如它的有声的影子”^{①8}。此处提出的“词”与“事”的关系,显然是可以展开讨论的命题,但托氏没有继续追究。

在评说“未来主义者、即形式上的革命创新者”时,托氏曾将其与“共产主义者、即政治上的革命家”进行对比(见第四章),这应该不是信手拈来的随意比较,因为在其他章节谈及文学家、知识分子的文字里,托氏也常常提出一个对应的主体“革命”、“十月革命”。他说“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决定性事件进入了俄国人民的命运,对一切事物表明自己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判”(第一章)。在这里,“革命”既是一个句法上的主语也是一个有意志的主体。而在描述革命的进展过程

时,托氏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将“革命”付诸实施的主体:工人阶级,并特别强调了“革命”如何“不懈地挑选工人阶级中所有优秀的、无畏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创建自己的党”。在托氏的叙述脉络里,工人阶级的党亦即“革命的先锋队”的“自觉的意识”,是推动社会局势变化的巨大“要素”,也是“革命的诗意”所在。他说“革命的诗意不仅在十月革命浪潮的自发增涨中,而且也在领导者政党清晰的意识和紧张的意志中”(第二章)。针对有些作家“没有别林斯基”的抱怨,托氏回答说“但是要知道,别林斯基不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而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领袖。如果活的别林斯基被带到今天,他很可能是一位——我不想向‘锻冶场’隐瞒这一点——政治局委员”(见第六章)。充溢在《文学与革命》里居高临下训诫和教诲知识分子、文学家的自信语调,应该来自托氏身为“政治上的革命家”、“时代的社会领袖”的“先锋”位置。

不过,在《文学与革命》里,托洛茨基并没有把“革命先锋队的预见和作用”绝对化和神圣化,他认为“党领导者无产阶级,却不领导历史的进程”(见第七章《党的文艺政策》)。因此,在讨论到党对文艺的领导时,托氏颇有些游移不决。他明确宣示“我们的标准显然是政治的、指令性的和不容异议的”。同时又说“但正因为如此,这一标准才应当清晰地划定其作用范围”。甚至认为“艺术的领域,不是党应当去指挥的领域”(《见第七章》)。类似的前后矛盾、摇摆游移的表述,也散见于该书的其他章节,表明《文学与革命》确实如同著者在第一版《序言》所说“还远不是完整和全面”的文本。

当然,作为一个在当时“和列宁是并提的”^{①9}革命领袖,托洛茨基能够全面地考察正在运动着的“现代文学”,发表闪烁着洞见(也不无偏见)的系统论述,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文学与革命》问世后,时任苏维埃

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撰写了长篇书评^①,其结尾的总括式评语说“此书是一部整体闪耀着光彩的著作,是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的杰出贡献”。了解卢那察尔斯基思路的人能够听出后一句话弦外有音,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能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成立的问题上,卢氏本来和托洛茨基持相反的观点,他赞扬持否定论的托氏的著作作为“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做出了贡献,是诚恳的,似乎也不无幽默的揶揄。而在书评正文,卢氏在不断击节赞叹的同时,也用了不少篇幅与托氏进行正面争论。20世纪20年代前期,革命政权下的苏联还盛行这种思想论辩之风,尽管《文学与革命》出自一个身居政治局委员位置的领导人之手,仍然是可以争论的一家之言。据说该书当时曾被“苏联的大学用为文艺理论课本”^②,那应该也不是指令性的教材。

鲁迅1925年8月26日第一次购买《文学与革命》的时候,人在北京,为支持女师大学潮而出任校务维持会的教职员委员,同时和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发起未名社,筹划出版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未名丛刊》。翌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同月,未名社出版的俄罗斯诗人勃洛克的作品《十二个》(胡敦译)收录了鲁迅翻译的托洛茨基著《亚历山大·勃洛克》,实即《文学与革命》的第三章。鲁迅为此书所写的《后记》特别提到托洛茨基的勃洛克论,称赞这位“喑呜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李霁野、韦素园着手翻译《文学与革命》时,曾和鲁迅商谈。1927年4月9日,已经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写给李霁野的信说“托罗兹基的文学批评如印成,我想可以销路较好”^③。同年6月9日,鲁迅回复李霁野说“托罗兹基的书我没有带出,现已写信给密斯许,托她在寓中一寻”^④,说的大约就是最初购买的茂森译本《文学与革命》。李霁野在《文学与革命》的

译者《后记》中说“茂森唯士君底日译本中有些注释可供参考,就请雪峰译出附在那里了”。当时雪峰使用的底本,可能就是由许羨苏找寻出来转给李霁野的鲁迅藏书。1928年3月14日,已经迁居上海的鲁迅为未名社出版物销售事致信李霁野,特别说到“《文学与革命》我想此地当有人买”^⑤。同月16日,鲁迅收到李霁野寄来的《文学与革命》四本,致信要求“能再寄我四五本更好”^⑥。如所周知,此时的托洛茨基已经被苏共开除党籍,流放到边地,这在韦素园、李霁野译本的《后记》里有所记载^⑦,鲁迅当然是清楚的。在此期间及其后,鲁迅曾在自己的文章里直接或间接地引用过托氏的文字,这已经有很多研究者考察和分析过。

关于《文学与革命》日译者茂森唯士(1895—1973),1981年版《鲁迅全集》仅注为“日本的苏联问题研究者”^⑧;在此还可略作补充。茂森出生于日本的熊本县,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1920年代属于左翼文化人,著有《列宁评传》(1924)、《俄罗斯的观点》(1925)、《苏联艺术的全展望》(1931)等,翻译著作还有卢那察尔斯基的《新艺术论》(1925)、斯大林的《苏联国家现状》(1930)等。但茂森的译文质量不高,他翻译的《文学与革命》出版不久即被批评“有改译的义务”^⑨。自1930年代后期起,茂森的思想立场发生“转向”,以翻译、著述为“日本帝国”的“国策”服务,二战以后亦以右翼论客著称。

注 释:

① 引自刘文飞等译《文学与革命》第5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参照内村刚介译《文学と革命》第1册第1页,东京,现代思潮社1965年11月。这两个译本是《文学与革命》的完整译本。

②③④⑨⑪⑬⑭⑮ 引自刘文飞等译《文学与革命》第7、7、7—8、8—9、7、1、5、172—173页。

⑤ 韦素园、李霁野译《文学与革命》1928年2

月由未名社作为“未名丛刊”第13种发行。据李霁野所写《后记》：“这本书原是素园要译的，动手不久就有了出京的计划，所以就英译校对了几章给我译，以便出京前把这本书译齐。以后素园并未成行，然而病了，不能再动笔，我底一部分工作也就拖延了，而译完后还能再用原文全体细校一次，这是觉得很觉不安的”。据此可知最后由李霁野完成的中译本主要是根据英文译本翻译的。据长堀祐造考察，《文学与革命》英文版(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1925年曾在伦敦和纽约两地刊行了同样的版本，唯一不同的是纽约本扉页上有著者给拉柯夫斯基的献辞。鲁迅1927年购买的英文本是纽约版还是伦敦版，在他的日记里没有注明。(参见长堀祐造《鲁迅とトロツキー》第45页，东京，平凡社2011年9月)韦素园、李霁野的译本扉页印有献辞，但这也可能是韦素园根据俄文原著翻译的，无法据此推定李霁野所据英文译本一定是纽约本。另据长堀祐造，英译本和茂森的日译本一样，都只选译了该书的前半部分(参见长堀祐造《鲁迅とトロツキー》第45页)。查韦、李译本，也只译了托氏的第一版序言，译作“引言”，并和茂森译本一样，删去了原著序言中关于第二部分的说明。

⑥⑧⑨ 参见郑异凡《托洛茨基读本·导言》，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6、16、1页。

⑦⑫ 参见胡萍译《托洛茨基自传》第31-38章，第39-41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⑩ 参见内村刚介《托洛茨基年谱》1922年条，内村刚介译《文学と革命》第I册第294页。

⑬ 此处参照茂森的日译本，刘文飞等人的中译本第一部总题译作“当代文学”。自此以下未加注释的引文，均据刘文飞等译《文学与革命》。

⑭ 在此章，托洛茨基首先指出未来主义起源于欧洲，并特别举出意大利未来主义和俄国未

来主义进行比较。为此，托氏引用了葛兰西一封“很有意思和内容充实”的短信，作为第四章的附录。茂森日译本收录了这封信，但韦素园、李霁野的中译本没有收入。

⑮ 此处译文据刘文飞等译《文学与革命》第170页。韦素园、李霁野译本此处译为“他们相信，‘起始是字’。但是我们相信起始是事。字追随着，有如它底声音的影子”(243页)。茂森译本此处译为“彼等にとっては「第一義的なものは言葉であった」だが我々にとっては、それが現実であった。言葉はその音響的陰影の如く彼等には考へられてゐたのであった”(245页)。

⑯ 参见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的文化论——为《文学与革命》的出版而作》，俄文底本据《资产阶级文化、过渡期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列宁格勒，1924年版)，此处据中岛章利、志田升的日文翻译《トロツキーの文化論〈文学と革命〉の出版に寄せて》转译，日译原载季刊《トロツキー研究》第8期，东京，托洛茨基研究所编辑、发行。

⑰ 据李霁野回忆，这是1926年初韦素园从苏联诗人特列季亚科夫(另一译名铁捷克)那里听到的，后者当时在北京大学俄文专科任教，曾赠给韦素园俄文版《文学与革命》一册。参见李霁野《我的生活历程》，《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第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⑱⑲⑳㉑ 《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7、552、614、616页。

㉒ 参见韦素园、李霁野译《文学与革命》第353页，北京，未名社1928年2月。

㉓ 《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页。

㉔ 参见长堀祐造《鲁迅とトロツキー》第48页注释(53)。

(作者通讯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邮编100084)